

陈骏涛口述历史

陈骏涛口述

陈墨采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骏涛口述历史

陈骏涛口述

陈墨采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骏涛口述历史/陈骏涛著;陈墨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0949-4

I. ①陈… II. ①陈…②陈…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6016 号

责任编辑 宋 强

责任校对 罗翠华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91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3.25 插页 3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949-4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言

陈骏涛

要为我做一部口述史——2012—2013 年之交，陈墨向我提出了这样一项动议。这是我先前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事，这就跟陈墨 1990 年拿出他出版的《金庸小说赏析》，新千年又从研究电影转而做口述史并研究口述史一样，都使我感到意外，感到突然。因此，尽管这是出自他的一片诚意，但我还是回绝了他。理由很简单：我是一个凡人，像我这样的人，不要说在知识分子圈中，就是在文学研究所，也是可以轻易抓出一把的，轮得上我吗？再说，即令搞出来了，又有哪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呢？

但陈墨却很耐心地开导我，说口述史不见得只有大名人可以做，小人物、平常人也可以做。他举电影圈为例，说不少人也都不是什么大名人，但因为有代表性，或者有某种特殊性，出于某种需要，也做了。人类的口述史料库就是由各色各样人物的口述史集纳而成的。

陈墨不仅从道理上开导我，还让我参加了电影资料馆一次关于口述史的研讨会，而且替我先期找到一个下嫁的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可是国内一流的出版社。虽然我这一生也出过一些书，并非没有见过世面，但这一切，还是不能不让我心动。我想，做做也无妨，借此机会可以把我这一生认真地梳理一遍，把那些不该遗忘的人和事留住，并传诸后人。年纪大了，做不成别的事，做做这件事也无妨，做好了，倒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就这样，“陈骏涛口述历史”就从拟议中而付诸实践了。2013 年，我得了一场大病，5 月和 7 月两次住了医院，还做了手术。这就迫使计划提

前,因为不仅是陈墨,连我自己都担心:越往后,体力、精力,尤其是记忆力,会越来越不行,记忆力一旦不行,还谈得上做什么口述史?于是,2013年9月,我出院才一个多月,这项计划就启动了。不算陈墨先期草拟的、长达32页的“采访提纲”,和我自己为此而做的功课,单单是口述,就做了16次,合计50多个小时,前后延续了两个多月。这是我这一生面对的最长的一次“马拉松”访谈,把我的五脏六腑都倒出来了。倒出来之后,就把包含着无数陈谷子、烂芝麻的口述录音交给了朱侠、洪玉华、冉一村这几位幕后角色,是他们忠实地按原貌把它变成了一部口述史初稿。可以想见,他们做出了多大的付出!

面对着这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口述史稿,我始则惊讶,继则发憊——这都是我说的?怎么说得这么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而且居然还如此唠叨?陈墨在“采编人杂记”中说我是个“不会讲故事的人”,算他说准了,我确实就是这么个不会讲故事的人。不会讲故事,还讲得颠三倒四、语无伦次,这样的口述史,人家看到了,还不倒胃口?怎么办呢?我想,既然走到这一步了,打退堂鼓是不行的,只能往前走,谁让你自讨苦吃呢!

我以前没有读过什么口述史,更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准备,按我有限的认知,我觉得,最基本的口述史,大致应该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采访人根据口述人的讲述整理出的稿子,这里不排除有整理人的若干加工或改造;另一种是口述人根据采访人整理出的稿子,自己动手再做一些修改和订正,也不排除有若干加工或改造。不经过修改订正、加工改造过的口述史当然也有,那就是原始状态的录音或笔录,但那是采访人或口述人才有的,而不是一般的读者或研究者能够或者需要拥有的东西。

于是我苦思冥想,决定对这部口述史稿动手术。在动手术之前或当中,我也曾与陈墨有过磋商,大致是秉持如下原则:第一,口述形式不变,框架不变,问题的顺序和问答的顺序也不变;第二,对明显错误或不准确的记忆作必要的修正,对虽然明知有误,但一时还拿不出准确修正答案的记忆,仍维持原样,只做了若干必要的注释;第三,本着“责人宽、责己严”的原则,删除了在口述时因过于随意而可能伤害到某些当事者,特别是那些还健在的当事者的言辞;第四,删除了某些重复的、颠三倒四的、过于唠叨的叙述,包括若干隐私;第五,增补了口述时因为种种原因而遗漏

2 陈骏涛口述历史

的若干必要的情节、人物、细节，等等。

总之，手术虽然动得不算太大，但也不算太小，但都以不伤筋骨为前提。从初夏到隆冬，历经半年之久，在这期间，我从未懈怠，一心扑在书稿上，主要工作是查找资料，边查找，边修改。因此，我这部口述史，应该是属于我上面所说的第二类口述史，即经过口述人修改、订正和加工、整理过的口述史。可不可以呢？这是我要向那些口述史行家讨教的问题。我想，但凡口述人还是理智的，他或她是绝对不会对一部包含着无数陈谷子、烂芝麻的口述史稿无动于衷的，除非他或她业已丧失了思维能力和行为能力。

2010年岁末，在史铁生逝世的时候，我写过一篇纪念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过程即目的”——史铁生的人生姿态》。我很欣赏史铁生的这种人生姿态，他把人生当成一个“过程”，他说“在永恒的道路上，唯有寄望于爱愿”，“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我在口述稿中说过：虽然我这一生过得不算太精彩，但也并不窝囊，我也重视人生的过程，把过程看得比结果更为重要，因此我始终不曾懈怠过。有心的朋友如果看到这部口述稿，将不难从中看出我的种种努力，尽管还有许许多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努力过了，因此我不后悔！

末了，我还要真诚地感谢陈墨、朱侠、洪玉华、冉一村他们做的许多事无巨细的工作，还有孙明强、孙伟雄父子的录音、录像，他们为此付出得太多，我的轻描淡写的感谢不足以补偿他们的万一。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刘国辉和宋强等参与其事的朋友，他们慷慨地为一个小人物的口述史开道，这是我先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我也要深深地感谢他们！

愿好人一世平安，我真诚地祝福他们！

2015年1月5日夜写毕于从心斋

目 录

序言	1
家庭、家人和少年时代	2
福建师专附中点滴	16
复旦大学八年(上)	32
复旦大学八年(下)	61
进文学所,去搞“四清”	74
1966 年的日记	90
恋爱、结婚和孩子	133
“干校”生活点滴	144
“干校”后期的部分家书	160
蹉跎岁月:1972—1975	184
《文学评论》复刊筹备	188
多重震荡的 1976 年	193
《文学评论》正式复刊	198
早期文章、笔名和稿费	205
新时期:文代会暨作代会	212
三位亲人相继去世	219
入党、评职称、加入作家协会	228
谈文学所 80 年代三任所长	236
1985—1986:新方法 with 研讨会	245
谈评论集《文学观念与艺术魅力》	253

“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及其他	263
第一次出国,去日本	272
借调到中国华侨出版公司一年	277
回到文学所,《文学评论》有变化	282
“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86
主编“跨世纪文丛”	291
尴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	299
主编“红辣椒女性文丛”	306
是女性文学研究会议的常客	313
中国小说学会:缘起和活动	322
从《中国文学通典》到《文坛感应录》	331
再次出国:访问加拿大	336
参与编纂《中华文学通史》	340
“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及其他	346
长女陈漫红英年早逝	353
世纪末的回声:文集、研讨、对话	357
“北会”、“南会”活动及《游戏的陷阱》	364
退而不休及《这一片人文风景》	371
流年碎影(一)	377
参与策划“世纪文学 60 家”	383
2006 年访问美国	387
开博客·去朝鲜旅游	392
流年碎影(二)	397
“昨日风景”与感言莫言获奖	404
文学评论选集《从一而终》	410
谈文学研究所的一些同事	415
谈一些熟悉的作家	424
谈熟悉的评论家、编辑	429
谈自己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	435
面对死亡:恐惧和感悟	441

对以往人生的简单总结	447
回顾人生的几点补充	454
附录一 何立人访谈录	459
出生、上学、工作的简历	459
亲历几次政治运动	467
“文革”开始时的文学所	470
与陈骏涛恋爱结婚	471
婚姻与家庭生活杂忆	476
附录二 陈骏涛生平和学术记事(1936—)	490
采编后记	518

口述人:陈骏涛

采访人:陈墨

采访时间:2013年9月—11月(16次,50小时)

采访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西里陈骏涛家

录音整理:洪玉华、冉一村、朱侠

口述人简介:陈骏涛,男,1936年8月21日生于福建莆田,祖籍福建福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曾任《文学评论》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社长、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名誉副会长。数十年来主要从事文学编辑、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工作,著有《文学观念与艺术魅力》《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文坛感应录》《世纪末的回声》《这一片人文风景》《从一而终——陈骏涛文学评论选》等,主编有“跨世纪文丛”“红辣椒女性文丛”和《精神之旅》等,与人联名主编有《中国文学通典》《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世纪文学60家》等大型文学丛书。曾获包括国家奖(《中国文学通典》执行总主编)在内的多种奖项。

家庭、家人和少年时代

陈墨(以下简称“问”):老师,咱们这就开始吧?

陈骏涛(以下简称“答”):好。病了一场之后,记忆力又差了。做事情都有点晕晕乎乎的,我很担心,这个口述史能不能做好。后来想,既然要做,那就早点做吧,越往后可能就越不行了。我今年(按指2013年)77岁了。从今年5月起就一直在生病,还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今年的记忆力就比去年差多了。

问:请先说说您家里的情况。

答:这个,我的家族观念很薄弱。所以你要问,我还真不能说得很清楚。特别是我祖辈、父辈这组人物。在我记忆中,好像就没有见过我祖父,可能在我懂事的时候,祖父就过世了。我父亲,好像他也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什么家族的事。我知道的家族的一点事,大多是从哥哥、姐姐那儿听来的,也没有什么留下的家族文献可供参考。所以你要我讲家族的事,可讲的确实不多,尤其是我父亲这个上线。

问:母亲这条线还好些?

答:母亲这边还稍好些。我小时候见到的祖辈人物只有外祖父和外祖母,他们曾跟我们住过一段时间,在我们家的后院,中间隔了一个天井。

问:他们的职业是什么?

答:不清楚。我们家族,不是什么富有家族,但也不是草根家族。至少到我父亲这一辈,就家道中落了。不是富有家族,从对子女的教育来说,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很不重视的。你看我有四个姐姐,连同哥哥和我,一共六个,真正受过高等教育的也就是我和我四姐——她现在福州,比我大五岁,我们都是解放后才有机会上的大学。

问：以前上学都很少哈。

答：是的。就天资来说，我哥哥是最聪明的，从他的谈吐，从他过去写给我的信，包括他临终前写的那首对母亲怀恋的诗，都可以看出他的旧学基础。我爷爷呢，他过去是干什么的，我还真不知道。从他留下来的这摊子来看，这个家是并不富有的，当然也不是穷人。^①我父亲呢，我知道他有一个哥哥，我小时候见过的，我们叫他大伯；他还有个妹妹，就是我姑妈，我也见过，在福州乡下。那时候，应该是福州解放前后吧，我去过他们的家，已经很破落了。

说起我父亲，他还算是有点历史的，他参加过北伐，在蔡廷锴的那个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那个时候驻扎在福建。他在蔡廷锴的部队里面，当到少校军需官，这是在北伐的时候。^②这事情是我哥哥亲口对我说的。从我需要填履历的时候，我对这段历史就从来没有隐瞒过。

问：现在看来，实际上是一段革命经历，北伐其实就是参加革命嘛。

答：对，北伐就是革命嘛。有人曾经问过我：本来是少校，为什么后来降到了中尉？这里面有一段历史，我哥哥跟我讲过。我父亲之所以从少校降到中尉，是因为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蔡廷锴这一边的人排挤、打压，我父亲就是在那个时候，北伐失败的时候，被排挤出来的。他原来是做后勤军需官，后来就到了盐警队——福建不是靠海嘛，沿海附近有大量的盐田——当个盐警，也就是管盐的警察，不是什么正规军。我父亲常年在外，一年也就回家几次，每次住那么几天，对家事根本就不管，更谈不上对孩子的教育了。小时候，我问过我母亲：“我怎么都没有看到我爹呀？”她说：“你爹赚钱去了。”全家这么多口人，就靠他的那点薪水，你说这个家庭能好吗？好不了。对儿女的教育也就那么回事，随他去。我甚至连像

① 口述人：这是我第一次口述，时间：2013年9月11日。当年10月，我携家人回了一趟老家福州，我小侄儿给了我一张清末年间陈家三代的“全家福”照片，照片上的人物有14人之多，其中有我祖父、祖母和父亲。父亲生于1896年，从照片看，父亲当时也就十四五岁，这是到了20世纪初年。从照片的排场和父祖辈的装束来看，陈家在当年绝非平民阶层，应该属于有点身份有点家底的阶层。但到了我父亲这一辈，确实已是家道中落了。

② 采访人：这一段叙述有问题。北伐时，蔡廷锴是在粤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二十八团营长、团长。参加南昌起义时，蔡廷锴才被委派为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以十九路军军长名义进驻福建，是在淞沪抗战后的1933年，那与北伐无关。口述人的父亲是否从北伐时就一直跟随蔡廷锴？需作进一步考证。

样的私塾都没有上过。他不管谁管呀？没人管呀！

问：您母亲不识字，是吧？

答：不识字。文盲啊，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父亲到底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还真说不清楚。

问：个性呢？个性是什么样的？

答：个性是不开朗的。解放以后他怎么回家的？福州临近解放的时候，风声不是很紧吗？那个时候苏公檀的父亲，也就是我四姐夫的父亲，我们都叫他苏伯伯的，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就宣布起义了。我父亲当时是他的下属，又是朋友，苏是盐警队大队长，我父亲是中队长，我父亲也就跟着起义了。当时解放军给了就地起义这条出路，不起义就只有继续跟着蒋介石到台湾去，于是他们就选择起义了。起义以后呢，大概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留在部队，接受改编；另一条就是发一笔钱遣散回家。后来我父亲就回家了，到底是共产党方面要他回家，还是他自愿选择回家呢，不清楚。那个时候我父亲年龄也不小了。至于苏伯伯，也就是苏公檀的父亲，他就转业到了地方上，还安排了一个什么职位，不大不小的，没多久也就退休了。我父亲的性格，是属于很不开朗，很内向，胸无大志的那种类型。他从来不跟我谈自己的事，也不跟孩子们交流。在家里，有时管管我们，太调皮时，就拿起竹箴子打那么几下。比如放学以后，你要是在外面玩的时间长一点，他就会拿着一个竹箴子，扑嗒扑嗒跑到外面来，叫“宝弟！宝弟！”^①回来以后打你几下屁股，就这样的。我记得他最会做的动作就是这个。

问：您母亲个性是什么样的？对你们的教育……

答：我母亲？谈不上对我们的教育了，她自己大字不识一个。家里这么多孩子，一共七个——我后面还有一个妹妹，够她辛苦的了。那个年代重男轻女，本来希望再添一个男孩的，结果出来的又是一个女孩，所以不久妹妹就送人了。

问：如果孩子犯了错，父亲要用竹箴子打，母亲呢？母亲是怎么管的？

答：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我母亲没有打过我，或者说极少打过我。我

^① 这是口述人儿时的乳名，因为他是家里最小的男孩，所以叫“宝弟”。

母亲应该是属于比较慈祥的人,至少对我是很疼爱的,我的小名就叫做“宝弟”嘛!

问:您对外公、外婆、舅舅们有什么印象?

答:对外公外婆我有点印象。但大舅跟我接触很少,解放前夕又去了台湾,我对他没有多少印象。对二舅的印象比较深,因为他跟我母亲关系很好。他喜欢喝酒,酒后醉醺醺的,就跑到我们家来,疯疯癫癫地说话。说到我外祖父,有一段时间外祖父外祖母就住在我家后厅,也就是后院。我对他俩有一个很深的记忆,那还是在日本军队一度占领福州期间。有一天,日本兵到我们家搜查来了,搜查后厅。不知道因为什么,他们还打了我外祖父。那时候我还很小,你想1941或1942年,我才五六岁嘛。后来外祖父为这件事,成天叨叨咕咕的,觉得挺冤,“为什么打我哇?”我外公、外婆不知道是什么出身。大舅我知道是国民党海军的。小舅好像没有什么正经的职业,酗酒,二舅母又很早就去世,就只有一个女儿。总而言之,我这个家庭呀,对孩子没有什么好的教育。整个家庭的环境并不好。所以说,我是先天不足,无论从教育还是身体条件来说,都是这样。

问:您的生日,农历是七月初五,换算成公历应该是1936年8月21日,但您填表写的是8月25日,为什么?

答:还有填成8月30日的呢!因为我只记得生日是旧历七月初五,至于公历是什么时间,我并不清楚,过去也没有换算过。你《提纲》中问:什么时候开始过生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件弄不清的事,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过生日的记忆。前些年,我还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嘛,叫《庆生》。^①

问:您出生在莆田,对出生地有哪些记忆?

答:这个莆田哪,还是后来我才弄清楚的。早年我填的履历是“祖籍福州,出生兴化”。但兴化后来一分为二了,一个叫仙游,一个叫莆田。人家问我到底是出生在莆田还是仙游,我说我不清楚。这个问题还是有

^① 口述人:又名《此情最堪思》,首发《天津日报》2006年12月19日,收入陈骏涛:《这一片人文风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一年回福建开散文家郭风讨论会的时候搞清楚的。^① 郭风亲口告诉我：你得记住，仙游是靠山的，莆田是靠海的，你的老家到底是靠山还是靠海？我说我可以肯定是靠海。为什么呢？因为我朦朦胧胧有点印象：小时候我们家就在海边，离海不远。为什么有这个记忆呢？我记得小时候我姐姐——可能主要是大姐和二姐——常常抱着我或者拉着我，带着我到海边去。所以可以肯定我的出生地是莆田，不是仙游。父亲那个时候也正好是在莆田当盐警。我很小的时候就搬到福州了——福州是我的祖籍嘛！在福州，我们住在南门的一个巷子里，那个时候叫福里营，现在叫什么就说不清楚了。曾经搬过一次家，无非就是在巷子里移动，从几号搬到几号，这么短的一个距离。我们那个小巷呢，是很不起眼的。后来之所以看重它，是因为在小巷深处，也就是我们家的对面，有一个协和医院，这是当时福州很有名的医院。在协和医院上面呢，还有一座山，叫于山，我们家就在于山脚下。福州有三座山嘛，于山是最大的。^②

问：想起福州老家，首先出现的场景会是什么？

答：出现的场景？一个是协和医院，在那个年代算是一座很不错的建筑，还有一个就是于山。

问：那家里的呢？自己居住地的场景呢？

答：很局促，很狭小，觉得挺憋屈的，没有自己的天地，也没有温馨的感觉。你想想看，就是那么一块小地方，做功课，写字，都是在饭桌上。开始的时候连电灯都没有，后来有了电灯，但又经常停电。为什么福州解放不久我就去参军呀？就是想寻找一块新天地嘛！

问：您有四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您对他们有什么记忆？

答：四个姐姐，我记得大姐、二姐，主要是小时候她们俩常带我到海边去。三姐、四姐那个时候都还小。你要我讲大姐、二姐的经历吗？

问：您记得多少？

答：我这个大姐夫，他是跟我大舅有关系的。大舅那时在福州马尾的一个海军基地，我大姐夫也跟着大舅到了海军，后来他们迁到了台湾。我

① 口述人：那是1994年五、六月间，在福建石狮开“郭风散文创作研讨会”，闽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曾齐聚一堂。

② 福州别名“三山”，城内有于山、乌石山、屏山三山鼎立。

大姐为什么到台湾去？就是找大姐夫去嘛，福州解放前夕就走了。二姐嫁给了一个警察——也就是我二姐夫，开始是在福建，后来到上海去了。我记得他可能是上海一个区的警局巡官，是个有点级别的军官，属于国民党军统这一系的。我二姐好像也是解放前就去了上海。他们一直没有孩子，后来在上海抱养了一个女孩。但好景不长，解放不久，也就是50年代初，可能是在“镇反”运动当中，我二姐夫被定成了“反革命”，发配到新疆劳改去了。二姐夫走了以后，二姐还一直待在上海，在上海闸北的一个小弄堂，一处非常局促的“亭子间”，母女俩就在那儿住着，我1955年到上海上大学的时候去过那个地方。后来二姐也搬回了福州老家。三姐呢，她嫁给了一个“南洋客”——跟三姐夫到了缅甸，一去不复返，现在也去世了。

问：您比哥哥小多少岁？

答：我比哥哥，恐怕要小20岁。

问：要小20岁呀？

答：有。他去世时是55岁，实际上是54岁，他是1981年去世的。

问：1981年去世，54岁，那应该是生于1927年。比你大不了多少——1981年减50应该是1931年，再减4岁就是1927年，比您大不了10岁。

答：对，那可能是1926年，1926年左右，那就差10岁，差不多。因为我哥哥排行第三嘛。如果他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肯定会比我有出息。他天分比较高，一些古诗词，他都能背出来。我曾问过我哥哥：你这些都是从哪儿学来的？他说从小教书先生（私塾）就教这些。我记得他的学历就是初中毕业，毕业后就当小学教师。后来他追随二姐夫到了上海，也在上海一个区的警察局当警察，可能也加入了国民党，又加上与我二姐夫的这层关系，解放后也成了“历史反革命”，被发配到南京江宁砖瓦场劳动改造。这个砖瓦场，实际上就是劳改场，跟当年的许多劳改场一样。后来劳改的人，有的刑满了，有的释放了，这个砖瓦场就变成了国营工厂。我1964年从上海复旦大学去北京报到的时候，特地在南京稍事逗留，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拐到江宁探望我哥哥。我哥哥后来提前病退也回到了福州老家，跟先期回到福州的我婆子和两个孩子会合，但没过多少安稳日

子,就得了胃癌,去世了。

我还有个妹妹,是在莆田出生的,比我大概小个二三岁?老辈人本来是希望再有个男孩的,生出来却还是个女孩,于是就送人了,据说是送给了一个“马桶婆”。那时候每家都用马桶,于是就有了倒马桶这个行当,一般都是女人干这种活,所以叫“马桶婆”。当时就约定的,孩子交给了“马桶婆”,就由她来转送给别人,家里人不能过问,约定俗成嘛。后来我妹妹就找不到,没消息了。妹妹送人这个事,是我稍大些的时候,已经回到祖籍福州了,听我母亲说的。母亲在说这件事时,还是挺伤心的!

问:1942年您到福州法海小学上学,在上小学前您念过《百家姓》,不会是在小学学的吧?

答:对,大概是请私塾先生到家里来教的,到底是定期还是不定期的,不记得了。家里对这些事很不重视,有一搭没一搭的,所以我说是没有上过正规的私塾,就是这么回事。

问:您去法海小学上学的第一天,是谁带您去的?

答:没有记忆了。为什么是在法海小学?可能是因为它离我们家最近。

问:对这个小学您没记忆了,是吗?

答:没有什么记忆了。我上中学的时候,曾经问过我家里,我这个记忆力怎么会这么差?后来家里人告诉我:你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很厉害的。对这场大病我倒是有点记忆,那时候好像是我二姐夫背着我上的协和医院。发高烧,主要是发高烧,好多天,那时我家里急得不得了,因为我是“宝弟”嘛。最后还是好了。后来我家里人说,我小时候很聪明的,生了那场病后就有点“木”了。我也觉得我脑子那个时候受了很大伤害,就跟今年生的这场大病一样。

问:下一个问题,您为什么从法海小学转学到光禄坊小学?

答:不记得了。

问:您小学毕业的时候,有没有小学会考?

答:没印象,真没印象。我怎么上的初中我都没有什么印象,真的。这还不像我大病的事记得清楚。

问:您上的第一所中学是榕西中学,应该有记忆吧?